□宫宏宇

清初来华天主教士与西乐东渐

——西文有关徐日昇、德里格研究回顾

摘　要：本文以时代为序，将历年来有关徐日昇、德里格与清初西乐东渐的西文论著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1687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近期（2000年至今），对每个时期的研究人员、研究侧重点、研究方法之进程与转变进行了分析与归纳。

关键词：徐日昇；德里格；西乐东渐；西文研究

DOI:10.14113/j.cnki.cn11-1316/j.2017.03.009

提及近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与西乐之东渐，有两个绝对绕不过的中心人物。一个是耶稣会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1645—1708，见彩插二），另一个是遣使会教士德里格（Théodoric Pedrini，1671—1746，见彩插二）。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昇1673年1月抵京，1708年12月24日在北京病逝，他以西洋乐器制作（尤其是管风琴制作）、清宫廷乐师（特别是以康熙皇帝的音乐教师，1672—1708）而名扬中外。他还是17世纪在中国介绍和传播西方音乐理论知识的代表人物，是我国"第一部中文西洋乐理书"《律吕纂要》的作者。[①]

徐日昇逝世三年后（1711年1月）抵京的遣使会意大利籍教士德里格在西乐东渐上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与其前任一样，德里格除了负责管理和维修宫廷里的西洋乐器外，还担当了康熙儿子的西洋乐理老师。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康熙帝命诚亲王胤祉在宫中开设蒙养斋修书处，编纂律吕、算法诸书时，将徐日昇、德里格所传之西洋乐理收入《律吕正义》续编。与徐日昇不同的是，德里格是唯一有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宫廷乐师殊荣的欧洲人。他所创作的奏鸣曲也是目前可见的18世纪创作于中国的欧洲器乐作品。

徐日昇、德里格虽然在西乐东渐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有关其事迹及具体著述的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中国史学者著文。[②]中国音乐学界对徐日昇、德里格在清初华土的音乐事工瞩目更晚，直到80年代中期才见端倪。[③]相比较而言，西文有关徐日昇、德里格的研究却有着相对持续的历史。从30年代起步，经50年代的发展，到近年来研究面向的多元化，西方有关徐日昇、德里格的研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　），男，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兼职教授，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员。

① 吴相湘：《第一部中文西洋乐理书》，原载《大陆杂志》1953年第7卷，后收入《近代史事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91—394页。

② 吴相湘：《〈律吕纂要〉跋》，原载《大光报·文史周刊》（1936年10月7日），《大陆杂志》1969年第38卷，第17—19页。吴相湘：《西洋音乐东传记略》，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1937年2月19日），后收入《近代史事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87—389页。

③ 如：王柔《中国最早印行的西洋乐理〈律吕正义〉续编的探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席臻贯《从康熙皇帝的音乐活动看〈律吕正义〉》（《音乐研究》1988年第3期）、王震亚《西洋乐理输入探源》（《音乐研究》1990年第4期）。

究不但在档案材料的挖掘上和史实的考证上有新的发展，在研究取向和分析论证上也有与国内研究相异之处。但遗憾的是，这些新的发展并没有引起国内音乐学者的注意。本文拟以时代为序，将西人历年来所发表的有关徐日昇、德里格与清初西乐东渐的论著略分为三个时期，并略述每一阶段的研究人员、研究侧重点、研究方法之进程与转变。

一、早期研究（以传教士为主的记述研究阶段）

（一）早期西文有关徐日昇在华音乐活动的记述

早期西文有关徐日昇在华音乐活动的研究，所采用的原始资料一般都来自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如南怀仁、闵明我、白晋、张诚等）寄往欧洲的书信。最早提到徐日昇在华音乐活动及其与康熙亲密关系的可能是 1658 年来华的耶稣会比利时籍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南怀仁在其 1683 年 10 月由同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带到欧洲，1687 年在德国迪林根（Dillingen）出版的《欧洲天文学》第 25 章（“音乐”）中，叙述了他目睹的徐日昇初抵华六年间（1673 年 1 月至 1679 年 1 月）在北京的音乐活动。在第 25 章和 26 章的结尾处，南怀仁反复提到徐日昇为南堂建造的大管风琴，在《钟表制造技术》一章中，南怀仁形象地描述了徐日昇建成机械时钟之后在京城引起的轰动。[①]

在南怀仁之后，提到徐日昇生平及其在华音乐活动的是葡萄牙早期最著名的书目编纂家巴博萨·马萨杜（Diogo Barbosa Machado，1682—1772）。在其 1752 年在里斯本出版的四卷本《卢琪塔纳图书馆书目》第三卷中，马氏提到徐日昇的生平及从教经历，词条末尾还列有徐日昇所著的四卷手抄本 *Musica Practica e Speculative*（《应用音乐与理论音乐》）。[②]

真正让徐日昇的音乐声誉名扬海外的是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据方豪先生考证，杜赫德在其 1735 年在巴黎首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中，提到南怀仁在康熙皇帝“前盛赞徐日昇精通音乐。帝乃派大员二人，迎日昇入京。抵京后，即研究中国音乐，后每闻中国乐曲，即能仿奏。”[③]杜赫德虽没有注明所据例证来源，但考虑到杜赫德本人从未踏足中土，《中华帝国全志》是以 27 位在华欧洲传教士发回法国的信件和报告等材料为基础写成，可以肯定他的叙述来自以上所提到的南怀仁著述。

法国耶稣会士卡洛斯·索默尔沃热尔（Carlos Sommervogel，1834—1902）在其 1895 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目》第六卷中的“徐日昇”词条中，除了提供徐氏的生卒年月日及抵京日期外，还列举了徐氏的三种著述：《南先生行述》、《律吕正义·续编》《应用音乐与理论音乐》（即 *Musica Practica e Speculative*，笔者注），并说明该西文著作“原为汉文，曾奉御旨译为满文。”[④]今人王冰虽然认为此说“并不确切，因为《律吕纂要》未曾刊刻”，但是她也觉得“费赖之怀疑这部书很可能就是《律吕正义续编》，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律吕正义续编》与《律吕纂要》的内容基本相同。”[⑤]

葡萄牙耶稣会史家佛朗西斯·罗德里杰斯（Francisco Rodrigues，1873—1956）在其 1917 年在

---

① Ferdinand Verbiest：*Astronomia Europaea sub imperatore Tartaro Sinico Cám Hý appellato ex umbra in lucem revocata*.Dillingae：typis & sumptibus Joannis Caspari Bencard，1687：88-93. 参见高华士（Noël Golvers）：《从 Compendia 到 Astronomia Europaea（1687）：一个历史语言学的分析》，收入魏若望（John W. Witek）编：《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1—72 页；王冰《徐日昇和西方音乐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澳门）《文化杂志》2003 年 1 期，第 86—87 页。

② Diogo Barbosa Machado：*Bibliotheca Lusitana* Lisboa：Na Officina de Ignacio Rodrigues，1752：746. Wang Bing and Manuel Serrano Pinto：“Thomas Pereira and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music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China”，in Luís Saraiva ed.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Portugal and East Asia IV：Europe and China：Science and the Ar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Singapore：WSPC，2012：150-151.

③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 5 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 年，第 11 页。

④ Carlos Sommervogel，S.J.：*Bibliothèque de la campagine de jésus* .Bruxelles：Oscar Schepens，1895，Vol. 6，col. 514. 参见王冰《律吕纂要之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4 期，第 69 页。

⑤ 王冰：《律吕纂要之研究》，第 80 页。

葡萄牙波尔图出版的《耶稣会智力训练》一书中，据徐日昇 1681 年 8 月 30 日和 1683 年 8 月 1 日发往欧洲的信，亦谈及徐氏在北京制作风琴事宜。[①]

1867 年来华，曾短期在崇明、海门传教，但长期在上海徐家汇负责藏书楼的耶稣法国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S.J.，1833—1891）在其《1552 年至 1773 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其著述》（1897 年出版石印本，1932 年出版铅印本上册）一书中，也提到徐日昇在华的音乐活动。在该书的“徐日昇”词条中，费赖之先是援引耶稣教士史家杜宁—茨博特（Thomas Ignatius Dunyn-Szpot，1644—1713）提到：“南怀仁神甫以其谙练音乐，荐之于康熙帝，帝命二使者招之至京师。……初入觐，即博帝欢，自是亘三十六年，宠眷不衰。”接着费赖之又根据南怀仁所记，叙述了 1676 年徐日昇与另一来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闵明我（Filippe-Marie Grimaldi，1639—1712）“同侗帝侧，帝命日昇弹翼琴（Clavecin），怀仁继弹中国曲。日昇静聆听之，按弹此曲，毫厘不失原调。帝甚惊异，命复弹，仍如前。帝讶而指日昇曰：‘是人诚天才也。’赏诸神甫贡缎二十四匹曰：‘汝辈袍已敝，可易以新者’”之事。[②]

费赖之是较早利用杜赫德的著述及以上提到的南怀仁《欧洲天文学》书中相关的记载来详述徐日昇在北京管风琴制作活动及所引起的轰动的：“日昇谙练音乐，曾在天主堂中装置大风琴一架，式样之新、节奏之调，华人见之者莫不惊异。同一堂上并安置大报时钟一架。铸有小钟多口，置于中庭，每一钟槌以铁丝系之。庭内置一大鼓，平时用齿轮羁之，鸣时轮脱鼓自动，周围有锐齿，轮系诸钟，合鸣成华乐，其声悦耳。朝野贵贱争往观之，莫不惊异。”费赖之也简单地提到了徐日昇、德理格与《律吕正义续编》的关系：“《律吕正义》五卷，前四卷，康熙皇帝御定，续编一卷，取日昇及意大利人遣使会士德理个所讲声律节奏而成，一七一三北京刻本。”值得注意的是，费赖之在列举徐日昇的遗著时，根据索默尔沃热尔在其 1895 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目》的“徐日昇”词条中提供的线索，提到徐日昇的“《实用音乐与欣赏音乐》（即 *Musica Practica et Speculative*，笔者注）原为汉文，一卷，刻于北京。曾奉敕译为满文。”[③]

1924 年来华、曾先后在天津工商大学、河北献县学院、上海震旦大学等天主教院校任科学和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的法国耶稣会士裴化行（Bernard-Maitre，S.J. 或 Henri Bernard，1889—1975）1935 年在一篇发表在《北京公教月刊》上的题目为《欧洲音乐在中国》的文章中，也提到徐日昇在西乐东渐上的贡献。[④]

（二）国人对徐日昇音乐著述的瞩目

国人对徐日昇清初音乐活动的瞩目也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但与西人天主教会学者不同的是，国人学者对徐日昇的兴趣直接源于《律吕纂要》的发现。1936 年 11 月，吴相湘（1912—2007）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普通书库里发现了《律吕纂要》（“汉文精缮本一册、汉文草写本一册、满文本一册”）。在将“精缮本与《律吕正义续篇》详细比对”后，吴相湘得出了“精缮本内容详于《续篇》多多，……事实上显然是《续篇》根据《纂要》删节而成，却不是《纂要》节录《续篇》‘以便记诵’的”结论。他认为《律吕纂要》出自徐日昇之手，“是早于《律吕正义续篇》成书的，换句话说，这一《律吕纂要》实在是近代用中国文字写成的第一本西洋乐理书”。因为“北大史学系主任陈受颐教授曾准备将其影印行世”，吴相湘随即“为撰《〈律吕纂要〉跋》一文”。1937 年，吴相湘还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西洋音乐东传记略》一文，其中第二节“西洋音乐的‘知音’——康熙帝”对以上提到的徐日昇在康熙面前展现他记谱能力的场景也有提及。[⑤]

---

① Francisco Rodrigues：*A Formação Intellectual do Jesuíta：Leis e Factos* .Porto：Liv. Magalhães & Moniz Editores，1917：494-495.

② Louis Pfister：*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S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32：381—383. 以上引文来自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中华书局，1995 年，第 381—382 页。

③ Pfister，*Notices biographiques*，冯承钧译，第 383—384 页。

④ Henri Bernard：“La musique européenne en Chine”，*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258（1935）：87-91.

⑤ 参见吴相湘《第一部中文西洋乐理书》、《〈律吕纂要〉跋》、《西洋音乐东传记略》等文。

吴相湘之后关注徐日昇及其他天主教来华教士在华音乐活动的还有中西交流史家、天主教神父方豪（1910—1980）。方豪基本上同意吴相湘的观点，认为吴相湘推测《律吕纂要》“出徐日昇手，不误，惟所据理由似不充分。”他根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徐日昇传中引述的索默尔沃热尔提到的线索——即徐日昇著有汉文本 *Musica practica et speculativa*（《应用音乐与理论音乐》）一册，在北京出版，皇帝曾命译为满洲文之史实——提出自己的猜想：“以予度之，此书既奉旨译为满文，似即《律吕纂要》，其后又节为《律吕正义续编》也。”[①] 方豪的主要贡献是他对中外文献的挖掘，特别是他对明末清初国人初次接触西乐后所发作诗文的挖掘，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尤其明显。如他引述的尤侗的《意大理亚竹枝词》、赵翼的《簷曝杂记》《瓯北诗钞》、赵怀玉的《游天主堂即事诗》等例证，不仅在后来陶亚兵、王冰等的论著中都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以下提到的西人的研究中也被重复引用。[②]

（三）早期有关德里格《小提琴独奏和通奏低音奏鸣曲》及其《律吕正义》关系的瞩目

与徐日昇很早就被耶稣会士著述所提及、耶稣会士学者所介绍的例子相对照，遣使会意大利教士德里格在华音乐活动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才引起天主教学者们的注意。1935 年，德里格的手稿《德里格小提琴独奏和通奏低音奏鸣曲》在北堂图书馆（即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图书馆）被发现。这一目前存世的唯一一部 18 世纪欧洲音乐原创作品在中国的意外发现，立刻引发了当时在华的天主教学者对德里格的兴趣。[③]

虽然以上提到的法国耶稣会士裴化行在 1935 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及德里格的奏鸣曲，[④]但真正开始就德里格进行深入研究的是德里格所属的天主教遣使会的在华教士。特别是 1904 年到上海的遣使会法国籍修士李蔚那神父（Aymard-Bemard Duvigneau，CM.1879-？）。

1932 年 6 月起即掌管北京天主教北堂印书馆事物的李蔚那神父[⑤]通过遣使会留存的档案资料，李蔚那不仅挖掘出了德里格的生平事迹及来华经历的珍贵史料，还对德里格寄回欧洲的一部分书信做了整理和综述。从 1937 年起，李蔚那陆续在《北京公教月刊》和上海意大利社团主办的《马可波罗》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⑥]这些文章以其扎实的史实对其后德里格研究奠定了基础。李蔚那还将德里格奏鸣曲手稿复印，交给巴黎一所音乐学院的 École César Franck 图书馆保存。[⑦]

20 世纪 30 年代对德里格在华音乐活动进行研究的还有当时辅仁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任教的卢华民神父（Theodore Rühl，S.V.D.）。卢神父会拉小提琴，是当时活跃在北京教会学校的音乐人之一。他虽然任教于辅仁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主要教授“西洋哲学研究”课程，但他另设通选课“和声学及

---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年，第 19 页。

② François Picard：“Music,” in Nicolas Standaert 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Leiden：Brill，2001：851-860.

③ 据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官方网站报道：2002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访问意大利时，曾将此德里格的手稿原样复制，赠送给意大利总统。http：//www.nlc.cn/nmcb/xw/201410/t20141021_91365.htm. Accessed：2016-11-22.

④ Henri Bernard：“La musique européenne en Chine”，*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258（1935）：88，note 3.

⑤ 李蔚那司铎，1879 年 7 月 21 日生于法国圣马丹·德塞尼昂区的翁德尔，1896 年 9 月 20 日入进修院，1904 年 5 月 28 日晋铎后于同年 9 月 17 日到达上海，之后先在江西东部传教，1914 至 1924 年间返回法国，1924 至 1929 年被调任北京栅栏大修院。1931 年 12 月起，在北京宗座代牧区传教，1932 年 7 月 1 日接任遣使会印书馆馆长之职。详见雷强《北堂印书馆 1931 至 1951 年刊印书目考》,《图书馆咨询学刊》2012 年第 10 期，第 145 页。

⑥ Aymard-Bernard Duvigneau：“Theodoric Pedrini，prêtre de la mission，protonotaire apostolique，musicien à la cour impériale de Pékin，” *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286（1937）：312-325；287：363-375；288：436-444；289：475-488；290：535-42. “Théodoric Pedrini，musicien à la cour impériale de Pékin，” Il Marco Polo 16（1943）：7-30.

⑦ Picard：“Music” in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853，n. 17.

作曲、高级钢琴班”，还组织成立了辅仁大学部的歌咏队。三十年代中期，他曾在辅仁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演奏过德理格的奏鸣曲。[1]卢华民还曾计划将德里格的奏鸣曲手稿影印加现代译谱出版，但由于日本侵华及后来战乱的原因，出版计划最终无法实施。[2]

30年代将德里格奏鸣曲搬上北京舞台的不仅仅有天主教传教士，还有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语系的小提琴手陆以循（1911—2003）和巴黎的乐人。[3]1936年10月11日在辅仁大学的一场音乐会上，陆以循演奏了德里格奏鸣曲作品之三中的第八首。1937年4月，德里格的另一首奏鸣曲也在巴黎嘉禾音乐厅演奏。据法国音乐学家皮卡尔（François Picard）考证，1940年，北京遣使教会的方立中神父（Joseph Van den Brandt，CM）在北京还曾出版过这份乐谱，但流传不广。[4]他之前编辑出版的《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中也有德里格词条。[5]1902年5月到上海，先是在直隶传教，后任北堂图书馆馆长的遣使会荷兰籍教士惠泽霖（Huber Verhaeren，C.M）在其自1939年起就开始编纂，至1949年才完成的《北堂图书馆西文善本书目》一书中，对德里格的奏鸣曲也列有简单的词条。[6]

除了在华的天主教会修士外，30年代对德里格有兴趣的还有日本的学者。如东京文献学派学人矢泽利彦（1914—？）就对德里格与《律吕正义》的关系极为关注，1937年在《东洋音乐研究》上发表的《〈律吕正义〉与德里格》。[7]

20世纪40年代，有寓华西人学者开始注意到德里格奏鸣曲的音乐风格和作曲手法。特别是德里格奏鸣曲与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小提琴家科莱利（Arcangelo Corelli，1653—1713）的奏鸣曲的相似之处。最初就此著文的是契拉兹（P.C.Chelazzi），他的《作曲家德里格及其时代》发表在上海意大利社团所办的《马可·波罗》期刊上。契拉兹认为德里格学过科莱利作品第5号，并猜测德里格来华时曾带来科莱利最新的作品。[8]

20世纪50年代，长期居住在巴黎的遣使会修士史家佛南德·康姆巴卢吉尔（Fernand Combaluzier，CM）继续对德里格的生平史实进行订正，他1952年在瑞士期刊发表的《德里格——传教士、北京帝国宫廷乐师》中，不仅提供了比较详实的德里格传记，在文章的结尾处还提供了一份非常宝贵的德里格来往信件的清单（数量不少于140封）。[9]康氏的研究最可贵之处是它对留存在法国的档案史料的挖掘，特别是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所藏德里格信件。[10]遣使会修士尼可拉斯·罗西特尔（N.S.Rossiter，CM）1955年也就德里格的生平撰写过文章。[11]

---

① 雷强：《北堂善本书目的编撰过程》，《文汇学人》2016年7月15日13—14版。关于卢神父在辅仁大学的音乐活动，参见孟维平《北京近代新音乐发展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3—124页。

② Peter Allsop and Joyce Lindorff："Teodorico Pedrini：The Music and Letters of an 18th-century Missionary in China"，*Vincentian Heritage Journal* 27. 2（2008）：43-59.

③ 关于陆以循，参见陈家骐《回忆我的恩师陆以循先生》，《水木清华》2010年第6期，第98—99页。

④ François Picard："Music，" in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ed. Nicolas Standaert，Leiden：Brill，2001：853，n. 17.

⑤ Joseph Van den Brandt：*Les lazaristes en Chine 1697—1935：Notes biographiques*（Pei-P'ing：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1936）：7.

⑥ H. Verhaeren：*Catalogue de la Bibliotheque du Pe-Tang*（Peking，1949），Nr. 3397（3584）.

⑦〔日〕矢澤利彦：《「律吕正义」与德里格》，《东洋音乐研究》（1937—1938），第11-33页。

⑧ Paolo Cesare Chelazzi："Composer Teodorico Pedrini and His Times，" *Il Marco Polo* 16（1943）：31-37.

⑨ Fernand Combaluzier："Théodoric Pedrini，le missionaire，le musicien à la cour impériale de Pék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8（1952）：270-87，9（1953）：149-51. Fernand Combaluzier，"Theodoric Pedrini，lazariste，missionaire apostolique，"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3（1957）：139-147.

⑩ Peter C. Allsop and Joyce Lindorff，"Teodorico Pedrini：The Music and Letters of an 18th Century Missionary in China"，*Vincentian Heritage Journal* 27.2（2008）：48.

⑪ N.S. Rossiter："Father Theodoric Pedrini，1670—1746，" in N.S. Rossiter，*Some Vincentian Missionaries*（Australia，1955）.

二、中期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00 年）

（一）若埃尔 · 加良（Joel Canhão，1927—2010）有关徐日昇在北京音乐活动的档案资料研究

在西方，1980 年代最早关注徐日昇在华音乐活动的是葡萄牙音乐学家、孔布拉（Coimbra）合唱学院艺术指导若埃尔 · 加良（Joel Canhão，1927—2010）。从 1986 年开始，加良陆续用葡萄牙文和英文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徐日昇在华音乐活动的文章。[①] 除了援引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叙述来描述徐日昇在康熙朝担任宫廷乐师的经历外，加良对徐日昇在抵华之前所受音乐教育背景尤其关注。用他自己的话说："徐日昇 18 前（即从 1645 年 11 月 1 日出生到 1663 年 9 月 25 日入耶稣会）在家乡布拉加所受的是什么样的音乐教育? 他 18 到 21 岁间在孔布拉初入耶稣会修道院时（1663 年 9 月至 1666 年 4 月）学到了些什么? 他在远东时又在何种程度上接触到了不同于欧洲的音乐体系? ……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哪儿、又是怎样学到制作管风琴的知识和技艺的? "[②]

若埃尔 · 加良研究的一个特殊之处是他对葡萄牙文献的利用。如他通过对罗德里杰斯《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一书中提供的葡萄牙档案文献的检索，他发现了徐日昇 17 世纪 60—80 年代在北京制作管风琴的一些细节。如在一封写于 1681 年 8 月 30 日的信中，徐日昇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他在北京的管风琴制作活动：

这位神父制造了另一台管风琴，这台琴置有四个音栓……其最大管长二米二十多公分。今年安装在教堂里时，受到空前的欢迎，无数人前往观看。我们不得不加派兵士在教堂门口及场地上以避免异教徒引起骚乱，同时也为前来观看的人群维持秩序。这些人们从没见过任何类似的东西，制琴者不得不每天弹奏许多个小时，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有时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曲子，他每十五分钟会放一拨人进来，每次弹琴不超过十五分钟。

若埃尔 · 加良认为，在这封信中，值得思考的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琴"置有四个音栓"，指风琴有四组管，能奏出四种不同的音调。这台管风琴"最大管长二米二十多公分"应该是指最长音管能奏出的最低音，但对所其发出的准确音高却无法由此推断出来。我们还需要知道该音管的内直径，管口的高度和宽度，以及管底口尺寸及厚度。第二，"制琴者不得不每天弹奏许多小时，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一个月，"。这里引起一个弹奏什么曲子的问题。是葡萄牙宗教性乐曲? 即兴而作的乐曲? 还是中国乐曲? 第三，"这件事轰动了朝廷。我们的琴声在当地人的耳际回荡，其中许多人因此接纳了基督教，并加以信奉。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所在。"这一段话显示了音乐在当地人的心理上所产生效果，正符合文章一开始时谈及音乐在中国传教事业上的重要性问题。[③]

在一封 1682 年 6 月 10 日从北京发出的另一封信中，徐日昇提到他给皇帝制作的"一些风琴"以及他利用管风琴制作来达到用音乐辅助传教的原因。在一封写于同年 8 月 1 日的信中，徐日昇又一次提到他"制造新管风琴的工作也已开始。康熙皇帝已有很多琴，但他还是要求我再制造和发明新的出来。其中一台管风琴高达五码，不用人触键就可自动演奏中国音乐。这台管风琴有装有小钟的机械装置，这些小钟经过很细致的调音，可与管风琴同时奏出同样的旋律。"徐日昇信中的这一描述与方豪发现的中国现存史料的叙述极其吻合。如乾嘉时期诗人赵怀玉在其《天主堂即事诗》中即有"楼头旋奏乐，仿佛八音调，转捩惟一手，吹嘘殊众窍"之诗句。方豪先生解释道："此大管琴盖康熙时徐日昇（西教士取此命者有二，此日昇字寅公）所造。"方豪先生又根据杜赫德和费赖之书中所述，提到了："西籍亦记华人见者无不叹赏。日昇又按琴键原理，制成小钟，悬于楼中，并置一中国锣，而以齿轮铁绳系小钟，能随意敲击，发出中国乐曲，抑扬可闻。京人士多往观赏，教堂虽大，竟不能容纳"。[④]

管风琴制作外，加良还引述了"礼仪之争"时在北京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José Suarez，1656—1736）在其 1697 年在里斯本出版的《在大清帝国传教之自由》一书中有关徐日昇向康熙传授

---

① Joel Canhão："Um músico português no século XVII na corte de Pequim：o Padre Tomás Pereira"，*Biblos* 62（1986）：519-535.

② Joel Canhão："Father Tomás Pereira a XVIIth century Portuguese musician in the Beijing court"，*Review of Culture* 4（1988）：22.

③ Canhão："Father Tomás Pereira a XVIIth Century Portuguese Musician in the Beijing Court"：22-23.

④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 5 卷，第 11 页。

包括音乐在内西学知识的章节。[④]

加良的研究对我国学者后来的相关研究有明显的影响。如王冰在其《徐日昇和西方音乐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就对加良提供的葡萄牙文献多次引证，特别是在叙述徐日昇"音乐的实践活动"一节中，她据以讨论的史料大都来自加良文章提到的线索。

（二）徐日昇与《律吕正义》中传入的西洋音乐理论研究与翻译

与国内学者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关注徐日昇、德里格编纂西洋乐理书的研究趋向相吻合，海外的学者从90年代起，也开始就徐日昇、德里格在西洋乐理东渐上所做的工作著文。华人学者罗基敏1993年在西班牙《音乐学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论文中，虽然以"新文献"为题介绍过《律吕正义》，但也仅仅是对《律吕正义续编》中徐日昇、德里格所述"声律节奏……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上图下说"等有关西洋乐理五线谱图例的批判性介绍而已。[②]同样，梁永生在其1994年提交给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西方对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音乐的影响》中，也提到过徐日昇、德里格与《律吕正义》中传入的西洋音乐理论。[③]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中真正对《律吕正义》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是德国学者戈林德·吉而特－波恩（Gerlinde Gild-Bohne）。1991年，吉而特－波恩在其提交给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中，不仅对《律吕正义》本书及其海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综述，她还将《律吕正义续编》翻译成德文。在1998年发表的《清代初期欧洲音乐理论的传入：徐日昇与德里格的成就》一文中，她通过对比《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续编》，得出了与吴相湘相同的结论，即前者的内容更为详细，后者的主要内容主要出自徐日昇之手。[④]

（三）20世纪90年代有关德里格奏鸣曲的研究与演奏

以上提到，葡萄牙的音乐学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徐日昇、德里格在北京清廷任职时的音乐活动，特别是他们乐器制作及演奏活动。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学学者和巴洛克乐器演奏家也开始加入研究者的行列。这期间，以美国费城天普大学巴洛克键盘学者、羽管键琴演奏专家乔伊斯·林多夫（Joyce Z.Lindorff，中文名"林乐诗"[⑤]）的研究最为突出。曾经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过访问教授的林多夫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研究从西方输入中国的键盘乐器，1994年她发表了在美国《早期键盘乐器研究通讯》上发表了《明清时中国的羽管键琴和击弦古钢琴》，其中提到了徐日昇、德里格。作为演奏家林多夫对德里格创作的奏鸣曲特别有兴趣。在为新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所撰的"德里格"词条中，她提到德里格奏鸣曲不仅在风格、结构和乐章类型上深受科莱利的影响，有几个乐句直接引自科莱利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第5号）。[⑥]由于专业音乐学家和巴洛克乐器演奏家的加入，1990年代有学者开始试图将来华传教士所创作的作品转变成音响。法国音乐学家佛朗索瓦·皮卡尔（François Picard）与法国巴洛克乐团XVIII-21Musique des Lumières创始人让－克

---

① José Suarez：*La libertad de la Ley de Dios en el Imperio de la China*. Lisbon：Miguel Deslandes，1696，Part II：70-71.

② Lo Kii-ming："New Documents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European and Chinese Music，" *Revista de Musicologia* 16.4（1993）：1899-1901.

③ Liang Yongsheng："Western Influence on Chinese Music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PhD. thesis，1994：10.

④ Gerlinde Gild-Bohne：*Das Lülü zhengyi xubian：Ein jesuitentraktat über die europäische notation in China von* 1713，Orbis Musicarum 8，Göttingen：Edition Re，1991；Gerlinde Gild，"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usical Theory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Achievements of Thomas Pereira and Theodorico Pedrini"，in Roman Malek，SVD ed.，*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Sankt Augustin：China-Zentrum and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8：1189-1200.

⑤ 关于林乐诗，张奕明曾写有《我所见到的林乐诗教授》，发表在《爱乐》2011年第9期；同期还载有题名为《寻找中国的巴洛克》的对林乐诗的独家采访。

⑥ Joyce Lindorff："The Harpsichord and Clavichord in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arly Keyboard Studies* 8.4（1994）：1-8.Joyce Lindorff："The Harpsichord and Clavichord in China" and "Pedrini，Teodorico，" in Stanley Sadie and J. Tyrrell ed.，*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2nd ed.，London：Macmillan，2001，Vol. 19：279-280.

里斯托弗·弗里西（Jean-Christophe Frisch）合作，最早将德里格所存的奏鸣曲手稿录音。他们 1996 年在巴黎出版的激光唱片《德里格：紫禁城中的巴洛克音乐会》中，包括德里格小提琴和低音奏鸣曲作品第三号中的第一、第四、第五、第七和第十首奏鸣曲。[①]

三、21 世纪后的研究状况

（一）徐日昇、《律吕纂要》与西洋乐理之东渐

进入到 21 世纪以后，以上提到的学者继续就自己的研究发表论著，如葡萄牙学者若埃尔·加良在 2001 年在葡萄牙出版的关于徐日昇的专著。[②]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学者也在此时开始将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用西文发表。如 2003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王冰就在澳门的《文化杂志》上用中文和葡萄牙文分别发表了《徐日昇和西方音乐知识在中国的传播》。[③]王冰是继吴相湘之后，国内非音乐界人士中最早研究《律吕纂要》。她的《律吕纂要之研究》早在 20 世纪初就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2008 年 10—11 月在里斯本和澳门举办《纪念徐日昇神父逝世 300 周年国际研讨会》和 2010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 12 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王冰提交了题为《〈律吕纂要〉内容来源初探》的英文论文。如文章题目所示，此文章的主旨是探讨徐日升《律吕纂要》的内容来源。王冰认为，德国著名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与来华耶稣会士的交往，以及他的许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很可能导致了《律吕纂要》中的一些内容取材于基歇尔的著作《音乐全书》第三到第八卷中的部分内容。其结果是《律吕纂要》将中世纪晚期至 17 纪的欧洲音乐理论，即有关记谱法、音、音程、音阶、拍子、节奏、速度等方面的乐理基本知识，最早介绍到了中国。[④]王冰还和已故葡萄牙阿维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曼努埃尔·品托（Manuel Serrano Pinto）合作在 2012 年发表了《徐日昇与十七、十八世纪西方音乐知识在中国》。[⑤]此文试图从“乐器制作”“音乐创作”“音乐理论”三个方面来探讨徐日昇在西乐东渐上的贡献。他们的结论是：17 世纪中国引进了两种重要的键盘乐器：翼琴（clavichord）和管风琴（pipe organ），其中后者在中国的制作及其影响直接归功于徐日昇。针对长期以来一些西文百科全书、辞典、一些文章中的“徐日昇曾用中文创作过赞美诗”之说，王冰和品托通过仔细查证耶稣会士的信件及天主教权威性的参考书（如索默尔沃热尔、费赖之、荣振华所编辞书），对此说提出质疑。

在 2008 年举办的《纪念徐日昇神父逝世 300 周年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上，以上提到的德国学者戈林德·吉而特也提交了题为《音乐传教：〈律吕纂要〉中的西洋音乐汉译之挑战》的论文。此文除了对这部论著作一个简介外，还旨在证明徐日昇所具有的广博的中文与西洋音乐知识。[⑥]在 2012 年发

---

① Teodorico Pedrini：*Concert baroque à la cité interdite*，ensemble XVIII-21，Musique des Lumières，Jean-Christophe Frisch（dir.）Astrée Auvidis E8609，rec 1996.

② Joel Canhão，：*Tom á s Pereira：mission á rio e artista na China dos finais de* seiscentos，V.N. de famalicão：Câmara Municipal，2001.

③ Wang Bing："Tomás Pereira e a divulgação da teoria musical do ocidente na China，" *Revista de Cultura* 9（2004）：123-147. 中文本刊登在（澳门）《文化杂志》47（2003）：71-90。

④ Wang Bing："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Lülü Zuan Yao*"，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3rd Centenary of the Thomas Pereira's Death：Thomas Pereira S.J.（1645-1708）：the Life，Work and Times"（October 13-15，2008，Lisbon）. 此文后来发表在《第 12 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文集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ed. Liao Yuqun et al（Beijing：Science Press，2012），pp. 83-96. 中文版见王冰《〈律吕纂要〉内容来源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33.4（2014）：411-426。

⑤ Wang Bing and Manuel Serrano Pinto，"Thomas Pereira and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music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China"，in Luís Saraiva ed.，*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Portugal and East Asia IV：Europe and China：Science and the Ar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Singapore：WSPC，2012：135-151.

⑥ 此文后经修改后于 2012 年发表。见 Gerlinde Gild："Mission by Music：The Challenge of Translating European Music into Chinese in the Lülü Zuan Yao"，in Artur K. Wardega S.J.，and Ant ó 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Tomas Pereira*，SJ（1645-1708），*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Newcastle upon Tyne，UK：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2：532-545.

表的题为《有关风琴手、风琴制作人徐日昇及其活动的一些新史料》的文章中，里斯本音乐学者、风琴演奏家若昂·保罗·热内卢（João Paulo Janeiro）则试图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徐日昇的音乐技能究竟是什么，他是从哪里获得这些技能的？他到康熙宫廷时都发现了些什么乐器？他在中国期间制作了多少件乐器？这些乐器都有何种特点？"①以上提到的乔伊斯·林多夫在同年发表的关于徐日昇的音乐遗产的文章中则就徐日昇在西乐东渐上的总体贡献进行了总结。②2008 年，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法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者詹嘉玲（Catherine Jami）也发表了《徐日昇——康熙朝廷的钟表匠，音乐家和口译员：葡萄牙的利益与科学之传播》。③

21 世纪以后徐日昇在华音乐活动研究的一个新趋向是博士论文的出现。虽然余少华、吴犇等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哈佛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完成的英文博士论文中已论述过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在西乐东渐上所扮演的角色，但由于研究着重点的不同，他们论文中对徐日昇在华具体音乐活动的叙述都略显单薄。赵慧儿 2007 在香港大学完成的论述西乐在十八世纪中国宫廷中之功用的英文博士论文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徐日昇在清宫的音乐活动。在贾抒冰 2012 年提交给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博士论文《西方音乐通过天主教传教事业在康乾盛世时期的传播（1662—1795）》中，徐日昇在华的音乐事工也是其重点讨论的对象。宋灏岩在其 2015 年在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更是"通过分析中国文化及徐日昇的文化认同问题，来回溯中葡两国的文明交流史"。④

（二）德里格书信档案资料研究、奏鸣曲演奏

2004 年，乔伊斯·林多夫在牛津大学出版的《早期音乐研究》学刊上发表了《传教士、键盘乐器与明清宫廷的音乐交流》，其中虽提到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日昇和之后的钱德明，但重点叙述的是德里格在北京的乐器制作和演奏活动及其创作的奏鸣曲。之后，她与科莱利研究专家、曾多次任中央音乐学院访问教授的巴洛克小提琴家彼得·奥索普（Peter Allsop）合作研究留存在欧洲各国档案馆中的德里格的信件和日记。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意大利罗马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拿波里等地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 1000 多页与德里格有关的信件和日记，所涵盖的时段长

---

① João Paulo Janeiro："The Organist and Organ Builder Tomas Pereira：some New Data on His Activity",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Tomas Pereira，SJ*（1645–1708），*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547.

② Joyce Lindorff，"Pereira' s musical heritage as context for his contributions in China", in Luis Saraiva ed.，*Europe and China：Science and Ar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Singapore：WSPC，2012：153–159.

③ Catherine Jami："Tomé Pereira（1645–1708），clockmaker，musician and interpreter at the Kanxi Court：Portuguese interest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cience", in：Luís Saraiva，Catherine Jami eds.，*The Jesuits，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1552–1773），Singapore：WSPC，2008：187–204.

④ Yu Siu Wah："The Meaning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Non-Chinese Music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nchu Court", 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1996：26–29. Wu Ben："Ritual Music in the Court and Rulership of the Qing Dynasty（1644–1911）", Ph.D. dis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98：195.Chiu Wai Yee Lulu："The function of Western music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court", Ph.D. thesi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 Jia Shubing："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music through Catholic missions in High Qing China，1662–1795",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Bristol，2012.Song Haoyan："O 'er português' e o 'outro'：Revisitar a História de Portugal no Diálogo Com a Civilização Chinesa – O caso Tomás Pereira", PhD thesis，Universidade do Minho，2015.

⑤ Joyce Lindorff："Missionaries，Keyboards and Musical Exchange in the Ming and Qing Courts", *Early Music* 32.3（2004）:408–410.Peter Allsop,*The Italian 'Trio' Sonata：From Its Origins to Corel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Arcangelo Corelli*："*New Orpheus of Our Tim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奥索普毕业于牛津大学和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曾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教多年。2007—2008 年曾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一年，并被聘为该院欧洲早期音乐研究室顾问。2010—2011 学年，奥索普再度来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任访问教授，开设"巴罗克的开端""历史的表演实践""西方音乐史——从贝多芬到二十世纪"等课程。

达 40 多年（1702—1744），其中有些文献出自德里格之手。2005 年 6 月 18 日，他们在剑桥大学举办的“音乐与早期现代时期的跨文化接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题为《从清宫到梵蒂冈：德里格半个世纪的信件》论文。2006 年 7 月他们又将此研究成果——《音乐、宗教与政治：德里格寄自清初宫廷的信件》会议论文——在华沙举办的《第十二届两年一度的巴洛克时期音乐国际会议》上宣读。2007 年，他们用意大利文合写的《活跃在中国宫廷的传教士音乐家德里格》在《意大利音乐学刊》上发表。2008 年，他们的英文论文《德里格——一个十八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音乐及书信》发表。①

就德里格原始资料的挖掘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德里格意大利家乡菲莫的独立学者凡比奥·伽来菲（Fabio G.Galeffi）和嘉贝丽·塔斯悌（Gabriele Tarsetti）。他们自 21 世纪初始，一直致力有关德里格档案资料的发掘研究工作。他们的众多研究成果，除在意大利的报纸和刊物上刊行外②，还在国际研讨会上和英文专书中发表。他们发现的众多原始资料对西方德里格学者（特别是对奥索普和林多夫）的助益甚大。在 2015 年发表的关于德里格在北京生活的英文文章中，他们通过仔细阅读他们发现的六百多封德里格本人或与德里格有关的信件和报道，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许多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德里格到北京之前和在北京生活及音乐活动的细节。③

进入到 21 世纪后，西方的德里格学者仍不断将德里格的奏鸣曲转化成听众可以聆听的活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示。如：在 2008 年 5 月 10 日，美国利玛窦之友会特邀林多夫和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访问教授的奥索普及湾区小提琴演奏家举行音乐会，演奏德理格的奏鸣曲，并讲述了其在华的有关活动及其影响。2011 年 3 月 6 日，在芝加哥 Ars Musica 举办的一场“从北京到巴黎：来自中国和来自巴黎圣文森特德 – 保罗的巴洛克音乐”音乐会上，林多夫不仅和美国著名的巴洛克小提琴家南希·威尔逊（Nancy Wilson）演奏了德理格的奏鸣曲，还为听众介绍了她所接触到的德里格的通讯及德里格在清代皇宫的音乐活动。同年 7 月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西方早期音乐研讨会”期间，来自国内外音乐院校的与会者也有机会聆听威尔逊和林多夫用巴洛克小提琴和羽管键琴演奏的德里格的奏鸣曲。2013 年 11 月 5 日，林多夫和威尔逊又为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全球科莱利——早期现代世界中的声名与音乐”国际研讨会参会者献上了德里格的作品。2014 年 4 月 9 日，在由马切拉塔大学孔子学院组织的“康熙皇帝的御用乐师德里格”研讨会上，意大利学者朗读了德里格从中国寄给家人的信件，小提琴家卢卡·马兹阿里（Luca Marziali）和

① Peter Allsop and Lindorff, “From the Qing Court to the Vatican : Teodorico Pedrini’ s half century of lett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Music and Inter-Cultural Contac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Corpus Christi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8 June 2005 ; Peter Allsop and Joyce Lindorff, “Music, Religion and Politics, Teodorico Pedrini’ s Correspondence from Early Qing court”, Paper for the Twelf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aroque Music（Warsaw, July 26th-30th 2006 ; Peter Allsop, Joyce Lindorff and Sara Dieci, “Da Fermo alla Corte Imperiale Della Cina : Teodorico Pedrini, Musico E Missionario Apostolico”, *Rivista Italiana di Musicologia* 42. 1（2007）: 69-104 ; Peter Allsop and Joyce Lindorff, “Teodorico Pedrini : The Music and Letters of an 18th-century Missionary in China”, *Vincentian Heritage Journal* : 27. 2（2008）: 43-59.

② Fabio G. Galeffi and Gabriele Tarsetti, “Teodorico Pedrini nei Documenti degli archivi dell’ Archidiocesi di Fermo”, *Quaderni dell’ Archivio Storico Arcivescovile di Fermo*, Anno XXII, n. 44（2007）: 59-98 ; “Teodorico Pedrini, un fermano tra la Santa Sede e l’ Impero di Cina”, *Quaderni dell’ Archivio Storico Arcivescovile di Fermo*, Anno XXIV, n.48（2010）: 103-118 ; “Teodorico Pedrini e la musica come strumento di missione,” in Stefania Nanni, ed., *La musica dei semplici : L’altra Controriforma*（Rome : Viella, 2012）, pp. 409-430.

③ Fabio G. Galeffi and Gabriele Tarsetti, “‘Mariner, Musician and Missionary, and True Priest Always’ Teodorico Pedrini’ s Life in Xitang”, i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ed.,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 Unveiling some less known sources, sounds and pictures*（Leuven :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2015）, pp. 125-151.

翼琴家瓦拉瑞亚·塔斯悌（Valaria Tarsetti）演奏了德里格和科莱利的几首奏鸣曲。2015 年 2 月 6—7 日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举行的“17—18 世纪天主教使团的全球音乐文化”工作坊期间，林多夫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音乐学家、巴洛克小提琴家大卫·厄文（David Irving）为与会者讲述并示奏了德里格的奏鸣曲。2016 年 4 月 7—9 日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意大利与中国，欧洲与东亚：几个世纪的对话”国际跨学科研讨会期间，在凡比奥·伽来非和嘉贝丽·塔斯悌的引介下，加拿大小提琴手米歇尔·奥德瑞克（Michelle Odorico）和羽管键琴手大卫·翰口曼（David Henkelman）演奏了德里格的三首奏鸣曲。[①]

为德里格奏鸣曲录制唱片的工作也仍在继续。2010 年，由拉芙利亚乐团演奏的题名为《中国之舟——从西班牙到东方的音乐之旅》的唱片在巴塞罗那出版，其中包括德里格的第五首奏鸣曲。2011 年，由早期音乐演奏团 Ensemble Sirocco 录制的激光唱片《德里格奏鸣曲》在维也纳出版发行。这张唱片含有德里格的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首。2016 年 11 月，由林多夫和南希·威尔逊从 2006 年即开始录制的《德里格小提琴奏鸣曲全集》在美国发行。[②]

结语

以上笔者以时代为序，将历年来发表的有关徐日昇、德里格与清初西乐东渐的西人论著分三个时期进行了简介。通过对每一阶段的研究人员、研究侧重点、研究方法之进程与转变的观察，可以看出：早期研究（1687 年至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者以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主，其特点是耶稣会士注重徐日昇、遣使会教士聚焦德里格。中期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00 年），有两个新的趋向，即研究者队伍的拓展和徐日昇、德里格家乡学者对各自国度人物的关明显注。非宗教背景的专业音乐学者、巴洛克键盘乐器演奏家和汉学学者从 80 年代开始加入研究者的行列，葡萄牙学者几乎无例外地聚焦出生在葡萄牙北部布拉加省（Braga）的徐日昇，意大利学者则专注意大利籍人德里格的研究。近期研究（2000 年至今），以巴洛克键盘乐器演奏家对德里格奏鸣曲的音乐学分析、国人与西人在徐日昇研究上的互动、德里格家乡学者的档案研究为特点。

---

① 资料参见：《利玛窦之友》*Newsletter*，No. 14（2008）. http：//www.ricci.usfca.edu；http：//vhrn-depaul.ning.com. Accessed：2016-11-21；欧阳韫：《“西方早期音乐研讨会 2011·北京”召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第 141 页；https：//music.anu.edu.au. Accessed：2016-11-24；http：//www.teodoricopedrini.it. Accessed：2016-11-24.

② 资料参见：*La Nao de China*，La Folìa. CD ed. Columna Musica 1CM0260，Barcelona，2010.*Teodorico Pedrini*，*“Sonate”*，Sirocco Ensemble. CD ed. ORF 2013568，Wien 2011.*Pedrini：Complete Violin Sonatas Op*. 3，Joyce Lindorff and Nancy Wilson，PALADINO MUSIC：PMR0057.

《清初来华天主教士与西乐东渐——西文有关徐日昇、德里格研究回顾》（插图）





①徐日昇（Tomás Pereira, 1645—1708）

②德里格（Théodoric Pedrini, 1671-1746）

③德里格《小提琴独奏和通奏低音奏鸣曲》手稿

《中国铜簧把乌类乐器研究》（插图）



傣族大、小铜簧把乌（云南景洪，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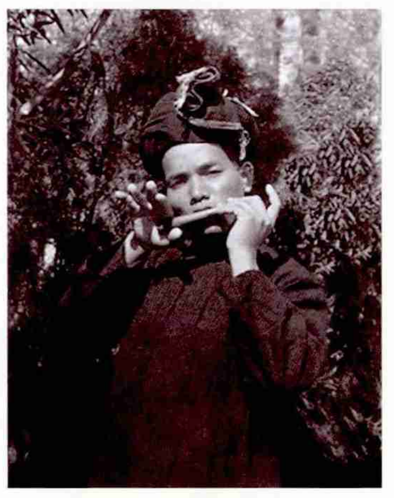
彝族铜簧小把乌吹奏（云南红河，1991）



苗族铜簧大把乌吹奏（云南丘北，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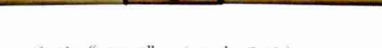
傈僳族带副管铜簧把乌
（云南腾冲，1986）



佤族簧角（云南西盟，1982）



哈尼族铜簧大把乌（云南元阳，1993）



傣族“班唠”（云南景洪）